



要勤学习、多读书：“善和书幸在，它日要人传。”“最亲切处今相付，熟读周公《七月》诗。”读书的乐趣、快感、幸福被陆游揭示出来，也传递给了子孙。陆游幼子在这样的氛围中也被培养为有名的藏书大家。

清代的陆陇其在给大儿子的信中深切地盼望他能够通过读书达到明理的目标：“我虽在京，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通过读书来做人，在做正派人基础上，通过读书来正确做事。

封建社会是以农为重的社会，强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概括古代中国人“拥有土地是人们经济努力和投资的主要目标”。人们把这种在土地上付出与回报是相等的思想，移植于家庭，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富有实效性。焦竑在《澹园集》中作了一个精妙的说理：“夫犀象珠璣，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挈而过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在于“犀象珠璣”对于农耕的人们来说没有实际用处。这一点，当然与那个时代物质匮乏有关，然而，质朴的实用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有意义的。这种实用精神体现到古人的丧葬观上就是摒弃浪费和虚妄，求得内心的平静才是最可宝贵的事项。

唐代名臣姚崇在《遗令戒子孙》中告诫子孙不可厚葬自己，就是从实用精神进行阐释的：“吾亡后，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佛事；也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南宋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中亦阐明这种观点：“若乃丧葬，仓卒之际，往往为浮言所动，多至妄用。”古人从实际精神入手，对一切事物看得非常透彻，这与国人的生存机遇与心理特征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严于律己

古人为官，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长期的仕宦生活培育出古代官员异于常人的可贵品格。古代官员希望将自己身上塑造的美德通过家风营造、家训传递的方式，让后代子孙能够从中汲取养料，从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栋梁。

明代杨继盛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告诫儿子要忠诚报国：“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南宋袁采在家训中告诫后辈做哪些事情是为人处世之忌：“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伤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君子不为也。”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告诫后辈如何治家处世：“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古人的这些言论都是比一般的规则和约束要严格，只有在严格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才能够有大的视野、大的格局、大的功勋。

树立正向激励风向标，理直气壮撑腰鼓劲，做到组织关怀有“温度”

杨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同时各级党组织也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关爱的态度亮出来、措施拿出来、温度升起来，以实际行动保护担当者、宽容失误者、支持干事者，释放强烈信号、凝聚强大合力。

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导向正确，干部就会见贤思齐、心齐气顺。要贯彻落实好干部标准，突出事业为上，坚持实践标准，注重从对党忠诚的高度评价担当作为，从精神和作风状况考察政治素养，既看日常工作表现，又看大事难事担当。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结果分

石志刚

讲究实用

古人在读书、工作、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治家心得和体会。对这些治家心得、体会进行分析和提炼，进而上升到价值判断、精神引领层面，则形成了富有丰厚内容的治家观。治家观在传承家风、延续美德、矫正缺失、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提倡学习

家中长辈基于自己对知识的占有和运用能够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希望将学习知识的良好风气传给家中晚辈。

杜甫给家中幼子杜宗武写了一首诗，诗中告诫其子：“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非常喜欢读《文选》，通过读此书开阔眼界、增长才干。杜甫把读此书的经验传递给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重视此书，通过阅读此书陶冶情操、培育道德。对于杜家来说，“诗是吾家事”，诗书是传家之宝，需要把良好学习读书之风延续下去。

陆游家族亦是耕读传家之族。陆游的高祖陆贻喜欢购书看书，撰写《修心鉴》，教育子孙如何读书。陆游祖父陆佃，虽然身居要职，但仍坚持学习，不仅藏书颇多，还著书二百四十二卷，显示出对经学、文学等方面颇深的造诣。陆游的父亲陆宰是宋代有名的藏书家，是当时浙中三大藏书家之一。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熏陶中，陆游从小就培育出酷爱读书的情操，自嘲为“书痴”。陆游希望把祖传的热爱读书的家风传承下去。他在《跋范巨山家训》中强调“人莫不爱其子孙，爱而不知教之，犹弗爱也”，意在告诫子孙要善于为子孙营造读书的良好环境。陆游写了许多诗篇，在这些诗篇中将父亲一颗谆谆教诲的心展示无遗。陆游首先在诗中告诫子孙要了解陆家的学风积淀：“经术吾家事”；在此基础上要“躬行更不疑”，不能拖累陆家；“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在诗中告诫孩子

元代对防止纸币贬值的讨论

□ 方宝璋

中国古代自宋代政府发行纸币之后，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就与纸币发行形影相随。在封建专制政权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发行超量的纸币是掠夺民财最方便的工具。元代在初发行纸币时，重视对发行纸币的管理，纸币价值比较稳定。但不久以后，由于财政入不敷出，纸币发行管理制度逐渐遭到破坏，终于造成日益严重的物重钞轻之势。面对这种情况，元代一些管理者对防止纸币贬值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预备充足的准备金

国家发行纸币必须有充足的准备金，并承担兑换的责任。元代，中统钞的发行，以银为准备金，称为“钞本”。元政府对中统钞的发行则要求准备金必须与钞本相等，即达到100%，这就是“发钞若干，随降银货”“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中统钞的准备金必须与钞本相等，虽然其做法不尽科学合理，未能充分接受宋人的经验，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朝廷对发行纸币所持的审慎态度，把国家拥有100%准备金作为稳定纸币市值的重要保证。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朝廷规定，各路钞库存储的钞本即准备金，必须应持钞人的要求以银兑换交钞：“如有诸人贲元宝交钞，从便却以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剋减添搭钱数。”由此可见，中统钞发行初期，不是宋、金时代不可兑换的纸币，而是可兑换的银行券。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至元钞法规定了纸币与准备金的兑换手续和比价：随路设立官库，通过官方买卖金银，兑换纸币，以稳定钞值。其比价是花银一两，入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贯，出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贯五分；赤金一两，入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十贯，出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十贯五百文。严禁私人买卖金银，违者依法将买卖的金银没收入官，并根据其买卖金银的不同数量处以不同的杖刑。

元政府在发行纸币初期，为了维护

纸币信用，让持币者随时可以兑换到金银，规定官库必须经常开库，不得任意闭库，库中必须随时备有金银兑换。如库中一缺金银，必须迅速报告，户部及时予以调配。

禁止使用银钞和铜钱

由于“至元钞五倍于中统（钞），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钞）”，以及民间所藏前代铜钱与大元、至大铜钱通用，对中统、至元钞形成巨大冲击，使中统、至元钞大幅贬值。对此，元仁宗在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诏书中“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

元人胡祇通也认为，在日常商品贸易中，纸币比铜钱便于携带，因此纸币当比铜钱更有优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铜钱其本身比纸币更具有价值，因此，如钞法经常改变，信用度不高的话，那铜钱与纸币并用，百姓往往更喜欢选择使用铜钱，从而使铜钱不断升值，而纸币不断贬值。胡祇通在《宝钞法》中指出，必须使纸币取信于民，“以便交易而已”。

控制纸币的发行量

元初陆文圭指出，“称钞法之策三，一曰住印造”，把停止印发纸币作为防止纸币贬值的第一条措施。他说：“物以少而贵，多而贱，贱则折阅，贵则宝重，此势然也……故虑楮之轻，莫若住造，民间鲜得，市价自平；取数既多，后何以继。或虑经用之阙，则又有说矣。此印造不可不住也。”这里陆文圭以比较直观的认识，即“物以少而贵，多而贱，贱则折阅，贵则宝重”的道理，来说明要使纸币不贬值，莫若停止印发纸币，市面纸币少了，自然就会升值了。

之后，王恽则从钞（纸币）与钞本（准备金）的关系来阐述纸币的发行如超出其准备金，就会导致纸币的贬值，这无疑在理论上比陆文圭深刻了。王恽指出：“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湧贵而难买。”基于这种认识，王恽主张用银回笼纸钞，减少民间所持有的纸钞，纸钞自然就会升值。他说：“今谓救其虚，莫若用银收钞，大路止用得课银

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体现了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的崇高地位的坚决维护，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决维护。步入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年期盼，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伟大实践中致力于实现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人自信的外部条件

经过建党以来97年的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之后69年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飞跃，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作为和国际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提

析运用，使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鼓励。建立完善“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机制，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坚决亮剑，为真抓实干的提供舞台。

亮明担当衡量标尺。让党员干部用开膀子干，必须解除其怕出错的顾虑，避免出现“洗碗效应”。要按照“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准确把握容错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进行综合分析。对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不是谋取私利、个人专断的，要大胆容错，为担当尽责者撑硬腰、鼓实劲。

体现关爱真诚情怀。厚爱，就要让党员干部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关爱。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在经济待遇、评先评优等政策方面给予倾斜，让他们安心、安身、安业，更好履职尽责。建立健全挂钩联系和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制度，设立基层干部关心关爱专项资金，对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帮助扶持，

一二千余定，小处一二百定，民间钞俭，必须将银赴库以倒换钞货，是钞自加重，银复归于官矣。”

厉行节俭务农

元初的陆文圭、胡祇通都有类似节俭务农以抑制纸币贬值的主张。如陆文圭在《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一文中提出“称钞法之策三”，其中“二曰节用度，三曰禁奢侈”。具体而言，陆文圭认为当时朝廷用度开支太大，是导致纸钞贬值、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必须节省朝廷用度。他还认为当时社会奢侈成风，衣食无度，也会导致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也必须禁奢侈。

胡祇通认为，当时农业凋敝，衣食匮乏，是导致纸钞贬值、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物安得而有余哉？由是观之，五谷衣帛常苦于不足，不足则不得不贵。失胎无母之钞十已六七，加以川流海溢，泛滥四出，已苦于有余，有则则安得不贱？为今之计，可敛者钞而无法以敛，可增者农而无法以增，饥寒日用之物日益不足，权信之楮币日益有余，贵者益贵，贱者益贱，虽使桑弘羊、刘士安之徒复出，亦无以为计矣。”当时有人提出：“改印新钞，一当旧五，期年之内，旧钞自废，钞与百物适平。”胡祇通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政府发行纸币，最重要的是要对民众讲信用，如失去信用，以新钞一当旧钞五使用，就会导致拥有大量纸钞之家破产，拥有粟帛之家不进行交易，最终于农工、于国家都没好处。因此，他主张，要使物价下降、纸币升值，最有效的办法是：“上策莫若务农，务农则地无遗利，粟麦布帛如火水，斗米三钱，其祥自至……为农者众，布帛五谷丰足，百物之价不劳估计均平而日自减贱。不妄费赏罚，支发兼以银两粟帛，则钞价日实。”

胡祇通还认为物价上涨、纸币贬值与风俗奢淫有关：“风俗奢淫于下，妄费谷帛。谷帛妄费则实用之物不足，不足则物价日增，物价增则钞日益虚。”因此，他又建议：“向之耗坏钞法之弊，如立总回易库，诸路行钱，以钞贵买诸物，买金换银，良马美女奇珍异货

升。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在有关国家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2万个就业岗位。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方案。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青岛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中国提出的主张与方案得到广泛认同，由此提升了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在习近平主席演讲结束后，二三十位国家元首等在走廊外与他握手。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随着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全球治理贡献的增多，被陆续写进联合国决议文件，成为彰显中国智慧的联合国官词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对情绪不稳定的进行心理疏导，主动帮助排忧解难。

严守党纪国法高压线，严肃认真问责惩戒，做到纪法约束有“硬度”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厚爱不等于“溺爱”，激励不等于“纵容”，不能拿容错当“保护伞”，搞纪律“松绑”、作风“减压”。党纪国法是红线、底线、高压线，决不允许触碰、逾越。

压实主体责任。干部出问题，组织有责任。对干部队伍监督管理不管不问，出现失职渎职的，就要追究问责。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问责重点，以强有力的问责推动主体责任落地生根。问责要对症，发生突出问题后要及时启动问责程序。问责也要精准，区别不同情况，分清不同责任，把“板子”打准、打实。抓住“关键少数”。从严治党，要抓

之贿赂贡献，今皆革去。但能节用务农，戒奢侈，去浮冗，抑游惰，只此数条，不惟实钞，一举而数得，实天下无穷之福。”

总之，胡祇通通过务农增加日用之物的供给，通过节用、戒奢侈减少对贵重奢侈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物价、升值纸币的目标。正如他所总结的：“行钞之法，钞为子而百货为母，母子相守，内外相应，货重而钞轻则敛钞，钞重而货轻则收货，一弛一张，权以取中，母子既以信相应，钞货价平而不偏，如此则虽行之于万世而无弊。”

元人郑介夫对前人的母子相权论又做了新的解读：“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他根据这一理论，指出后出至元钞以一贯相当于前出中统钞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本末倒置，所以导致至元钞法混乱，纸币贬值。因此，这种以印发新钞来解决旧钞贬值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他说：“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錠者，盖则乎银錠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兆讖也。今物价日贵，钞价日贱，往年物值中统一钱者，今值中统一贯。如至元钞五厘与一分，买不成物，街市之间，无所用焉。久而不革，则至元一贯仅值中统一钱，物值钱而钞不值钱，将见日贱一日，而钞法愈见涩滞。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因此，他建议印制发行比至元钞“轻”的大德新钞为“子钞”，来升值至元“母钞”：“当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兼行。大德五贯或二贯，准作至元一贯，明以大德易中统，不过扶至元之轻，以整一时之弊，钞母既起，则物价自平矣。”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底气的，更是与忧患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慎终追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说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认可、自我激励、自我鼓舞的话，那么忧患意识源自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作者郝永平系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洪巧英系中共民航局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上级党委监督的作用，提高巡视巡察政治站位，从政治上审视问题，从担当上查找不足，准确把握政治生态状况，充分认清“树木”和“森林”辩证关系，把最典型的“烂树”精准“拔”出来。

依纪依法处置。依纪依法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问责惩戒党员干部的根本标准。要发现和解决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查纠“四风”、惩治腐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等结合起来，持续正风反腐肃纪，始终保持警醒震慑的高压态势。同时，也要健全完善澄清保护机制，加强被问责干部后续管理。对积极改正错误，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群众认可的，处分影响期满后，该使用的要使用，防止“一棒打死”。

（作者系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